

中國歷史上的「瘴氣」考釋

Textual Researches and Explanations of Miasma in Chinese History

牟重行*1 王彩萍*2
Zhonghang Mou Caiping Wang

Abstract

Miasma, as an old idea of disease geography, had much relationship with the climate, vegetable and landforms in the south of China. However, miasma phenomenon in most historical records was misunderstood as fog or haze and other weather phenomena. It was not so clear in the history on the idea of miasma disease which is regarded as malaria in the old days in medical circles.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miasma diseases in broad sense, include various endemic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south, while in limited sense include common cold, malaria and sunstroke etc. Theory of miasma began at the 1st century and gradually disappeared since the middle on Qing Dynasty with the large-sca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It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idea and widely spread of medical knowledge. In addition, miasma is still related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disease category in some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information is still of much value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Miasma phenomenon, Disease geography, Historical geography.

中文摘要

瘴氣作為古代的疾病地理概念，主要與南方氣候、植被和地貌有關。但大量歷史文獻記載的瘴氣現象，却多數是對霧或塵霾等天氣現象的誤解。歷史上關於瘴的疾病問題也十分模糊，醫學界往往以為過去之瘴即今之疟疾，而實際上廣義的瘴病包括南方所有地方病和傳染病，狹義的瘴病則指感冒、疟疾和中暑等症。瘴氣之說在中國始於公元1世紀，自清代中葉後，隨著南方地區的大規模經濟開發而逐漸消失，其主要原因可歸結為傳統觀念的轉變和醫學文化普及。此外，歷代有關瘴氣的許多文獻記載，也涉及環境變遷和人類

*1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氣象局高級工程師

*2 浙江省台州市中心醫院主任護師

疾病谱诸方面的史料，这些历史信息在今天仍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關鍵詞：中國歷史、瘴氣現象、疾病地理、歷史地理

一、引言

瘴氣，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神秘的疾病地理現象，按辭書的通行解釋，意為舊指華南或西南地區山林間濕熱蒸鬱致人疾病的氣體¹。其說始於東漢，初作「障」字，見建初元年(公元76年)楊終上漢章帝疏：「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中國最早有明確紀年的瘴氣事件，發生在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至二十年。據《後漢書》記載：是年，馬援率漢軍討伐交趾(今越南北部)，「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及「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等。然漢時尚未出現「瘴」字²，以上《後漢書》之載，可理解為到了該書作者範曄(公元398~445年)的東晉南北朝時代，「瘴」字已由「障」衍化而成形，瘴之說並為學界普遍接受。如《魏書》記載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魏西征軍攻吐谷渾，「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有疫疾，乃引軍還。獲畜二十余萬」。北魏軍隊在青海高原遭遇的這次事件也是中國西北地區最早的瘴氣記錄。但自後歷隋唐而南北宋，對瘴氣的認識大多與熱帶或亞熱帶地理有關，瘴氣所致的疾病也逐漸成為南方特有的地方疾病之代名詞。

歷史上瘴氣肆虐，曾吞噬過無數遊人軍旅的生命，有時即土著居民亦難免滅門之禍。雲南《鎮越縣誌》載昔日淒涼情景云：「每年瘴疫盛行，人畜死亡，頗足驚異。有數人死亡者，有舉家死亡者，有全寨死亡者，如彎弓、麻裏等處，昔為繁盛之區，今則絕迹。又漫乃、漫撒諸鄉雖屬發祥之處，日就衰頹。據長老談，百年以前，最稱富庶，今則人煙稀少，僅十分之一耳」(趙思治等1938：43)。古之瘴區，又是封建王朝貶遣罪臣的去處，杜甫有「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³之歎；而讀王陽明《瘞旅》文：「道旁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⁴，至今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瘴氣之詭異莫狀，瘴毒之猛如蛇虎，給古人以極大的恐懼。在今日科學昌明時代，瘴氣雖然早已寂然無聞，但留下的大量歷史實例或者傳說，尚有許多令人迷惑的問題，筆者根據歷史文獻中有關瘴氣的記載進行分類整理和綜合分析，就瘴氣這一歷史地理現象略述管見。

二、關於瘴的名稱

瘴之名有數十種之多，僅這些紛繁的名稱就可見其複雜性。範成大說：「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這是宋代流行於廣西左、右兩江流域的幾種季節性瘴患。筆者彙輯各種文獻提到的瘴名⁵，將其歸納為以下五類。

¹ 例如《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出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的「瘴」條，皆作如是解釋。

²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未見「瘴」字。該書於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編成，彙輯漢字10639個。

³ 見《杜工部草堂詩箋》卷14，〈夢李白〉詩。

⁴ 王守仁《瘞旅》文，據《陽明先生集要》，四部叢刊本。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號陽明，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因忤宦官劉瑾，貶貴州龍場驛(今修文縣)。

⁵ 如郭棐《廣東通志》提到廣東山區流行的瘴氣有：「五月曰青草，九月曰黃茆、曰桂花、曰菊花」。見卷一，氣候，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刻本。

- (一) 以植物為名。這類冠以植物名稱的瘴，多數與瘴病流行季節的物候相聯繫，如江南草長有青草瘴，梅雨時節流行黃梅瘴，新禾漸秀稱禾黃瘴，秋茅蔽野曰黃茅瘴。這四種瘴，於歷史文獻中最為著稱。此外有：百花瘴、黃芒瘴、黃茆瘴、黃梅瘴、梅瘴、梅花瘴、新禾瘴、黃麻瘴、菊花瘴、荷花瘴、黃竹瘴、交頭瘴、芳草瘴、黃葉瘴、黃瓜瘴等。
- (二) 以動物為名。凡含動物名稱的瘴，皆有此種動物即為該瘴之毒源的意思，如：蛤蟆瘴、烏蜂瘴、孔雀瘴、蚯蚓瘴、曲蟾瘴、螃蟹瘴、螞蝗瘴、黃鱔瘴、泥鯁瘴、蛇瘴、蝮蛇瘴、朴蛇瘴、蚺蛇瘴、鸚鵡瘴等。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江西上猶縣大疫，相傳是廣西桂林飄來的瘴毒所致，當時有一首《疫歎》詩，將此歸咎於蚯蚓排出的毒素，而美麗的桂林因此竟被詩人視作「霧域蚯蚓城，瘴癘所出沒」的可怕瘴區。
- (三) 以天氣現象和地理實體為名。意指這些天氣現象和地理實體即為瘴毒載體，歷史文獻中較多出現的有：煙瘴、嵐瘴、炎瘴、黃沙瘴、暑濕瘴、毒淫瘴、毒水瘴、新水瘴、旱瘴和山瘴，以及瘴江、瘴海等。
- (四) 以疾病症狀為名。按人體觸染「瘴毒」出現的症狀或發病部位命名，如腹痛難忍稱攪腸瘴，精神錯亂及症見異常稱鬼瘴。有：冷瘴、熱瘴、寒瘴、濕瘴、啞瘴、鎖喉瘴、瘴痢、瘴瘡、瘴疽、烏痧瘴、尋常瘴、黑腳瘴、揪頭瘴、烏腳瘴和疔瘴等。
- (五) 以特殊氣味為名。見有江米瘴、香花瘴、桂花瘴、花風瘴、香瘴等名稱。如桂花瘴指山野間有若桂花香氣者，江米瘴為江邊有類炊米飯氣味者。

上述種種瘴名，有些屬於一瘴多名現象，因習稱不同或傳寫各異造成，亦存在不同含義問題。如對「冷瘴」的解釋；一說指觸冒瘴氣所致的發冷發熱症狀；一說指西北冬季的一種瘴，以冷氣中人，症狀為腿足腫潰⁶。

(六) 瘴母的傳說

諸種瘴氣最神奇的莫過於稱作「瘴母」的東西，或可通俗理解為凝聚成團的瘴氣，在中國西南和嶺南地區相傳久遠。舊稱：「南方多有煙瘴，謂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通，如柱，少頃散漫下，似黃霧。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曾瓶山等1932：1)。其說多見於唐宋時期的筆記，如劉恂《嶺表錄異》、鄭熊《番禺雜記》、陸遊《避暑漫抄》等。而傳說的原型，恐怕又源于晉代志怪小說《搜神記》中的「鬼彈」一說：

漢永昌郡不違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為「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過十日，皆死。

按，漢之永昌郡不違縣，治所在今雲南保山縣附近，禁水即瀾滄江。與歷史上所有傳說一樣，流傳越久遠，則愈離其譜，如上述「不見其形」的鬼彈，後來則形聲兼具。雲南《永昌府志》載：「瀾滄江歲五、六月中，江中有物色如霜，光如火，聲如折木破石，觸之則死，或云瘴母。《文選》謂之鬼彈，《內典》謂之禁水。此惟江邊有之，郡治絕無」(宣世濤等1785：1)。在廣西象州，又完全被描述成一種魔器，「瘴

⁶ 見馮漢鏞著《瘴氣的文獻研究》，引《清稗類鈔》語，《中華醫史雜誌》(1981)，北京，第1期，頁44。又，馮先生歸納瘴之命名特點為三類：發病時間；症狀；致病原因。見頁46。

母至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者為痞閉，為瘋症，為汗死，人若伏地縱其擲則無恙⁷。這種廣為流傳的奇異自然現象，而生活在瘴鄉的土著居民，倒是「習然相忘，亦不見所謂彈丸、車輪也」(曾瓶山等1932:1-2)。大概誰也沒有真正領略過。

三、瘴氣的生成說和地理分佈

(一)氣候生瘴說

在瘴氣成因諸說中，古人首先將其與氣候環境相聯繫，普遍認為氣候偏暖是滋生瘴毒的主要原因。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稱：「南地暖，故太陰之時，草木不黃落，伏蟄不閉藏，雜毒因暖而生。故嶺南從仲春迄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迄孟冬，行黃茅瘴」。此為中醫典籍中，首將瘴氣之緣起咎於南方氣候溫暖者。關於瘴氣和氣候環境的具體關係，前人有許多經驗之談，如：「嶺南有霜之地，即無瘴」(管一清等1754:26)；蘇東坡詩「江南無雪春瘴生」⁸，說明瘴氣發生與冬季溫度條件相關。祿勸是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個縣，處掌鳩河谷地，舊稱「祿勸氣候不齊，江居恒燠，八月鬼箭交頭則瘴起⁹，山居恒寒無瘴」(全奕澤等1928:33)，觀察到瘴氣分佈隨山地氣溫垂直遞減現象。在某些地區，瘴氣存在季節性流行規律，也是對溫度敏感的一種表現，如湖南桂陽的地方文獻說：每年三月至九月是瘴氣發生的季節，但俟至霜凍時候，瘴患就自然而匿(常慶1817:86)。我國嶺南的廣大地區古有「炎方」之號，故自來說瘴氣者，大都以嶺南論。

瘴氣除以上「熱成論」外，又有炎濕、雨濕生瘴的說法：昔以雲南東川府碧谷、巧家、小江一帶「夏秋間濕熱相蒸，多瘴癘」(崔乃鏞1753:4)；廣東樂昌縣過去常見秋季瘴嵐瀰漫，系「炎濕所薄」而成(張日星等1687:13)；貴州的施秉則由於「夏季雨量極大，霧郁濕郁，居民多瘴癘之患」(劉顯世等1948)。能綜合南方氣候特點探討瘴氣成因者，當以宋代李鏐《攝生論》為代表，他說：「嶺南瀕海地沈，燠陽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無雪。一歲之間，蒸熱過半；一日之內，氣候屢變。晝則多燠，夜則多寒；天晴則燠，陰雨則寒。次寒熱瘴氣所由作也」¹⁰。李鏐，字西美，是12世紀初葉一位對瘴氣頗有研究的學者，著有《嶺南衛生方》四卷，還有與戶部侍郎張致遠合輯的《瘴論》二卷(李雲1988:310)。清代地方誌談風土瘴氣，多有引用李說為據的。

在氣候和瘴氣的種種揣測中，湖南民間流傳有「今歲秋得嚴霜，冬得積雪，則來歲豐稔可期。若霜雪不降，或淫雨過期，或亢陽作旱，瘴癘因之而作」等說法(常慶1817:86)。從現代流行病學觀點分析，氣候異常作為一種非特异性因子，確實影響疫病流行的許多環節，而我國古代積累有大量此類經驗或記錄，也是一份亟待發掘的歷史文化遺產。

(二)地形與植被生瘴說

在南方瘴區，古人所說的瘴氣孳生環境，多數為未經開發的山區和密林莽原之地。其論地形與瘴氣關

⁷ 廖蔚文等《三江縣誌》(1946)，見卷1，氣候，引《象州志》語。

⁸ 見《蘇東坡集》。

⁹ 鬼箭，即鬼箭羽，衛茅科植物。

¹⁰ 轉引自王贊《瓊山縣誌》(1708)，卷1，氣候，頁11。見所錄舊志附文。

係：一說多山之地即多瘴，如唐詩有：「洛浦風光何所以，崇山瘴癘不堪聞」¹¹，以為「瘴者，山巒之氣鬱積而成」（王文驥等1823：7）；一說地形封閉易生瘴氣，有人分析雲南保山地區的瘴患原因稱：「尤其異者，凡兩江之間與土司之內，皆有瘴，上江之瘴尤甚。大抵山太高，水太深，則山澤之氣不通，鬱蒸而為瘴」（宣世濤等1785：1-2）。故普遍認同的事實是深谷盆地瘴重，平川濱海瘴輕。舊稱福建龍岩縣經常發生瘴患，由於該地「四塞皆山」，空氣不易流通的緣故（江藻等1689：15）。過去討論地形與健康的關係雖常帶堪輿家語，然其中亦暗含一些衛生科學道理。

關於谷地多瘴患的問題，近代貴州《平壩縣誌》作了很好的闡述：「黔桂號稱瘴癘之鄉，然亦須辨，如本省羅斛（今羅甸）、白層等地，介於山谷，形成窪下，窪下則濕。山谷晝則日能射而風不得入，夜則谷風襲而地溫更放散，一日之間，寒暑頓變，更加以地濕蒸發，黴菌滋生，於是寒也、暖也、黴菌也，輾轉因緣，衍成瘴癘。所以瘴癘之作，每年必自陰曆三月以後起，九月以前止，純在濕熱之季。平壩既非山谷，地段又無酷暑，故無瘴癘」（江鍾岷等1932：22）。此為我國20世紀30年代之試用小氣候觀點詮釋瘴氣者。

舊時南方多保持良好的天然植被，古人亦視此瘴之淵藪。江西《龍南縣誌》稱該地過去「樹木陰翳，地氣濕蒸，向有煙瘴氣」（孫瑞徵等1876：5），又以漫野黃茅際天為生瘴原因。歷史上的這些說法，有時竟也十分隨便。如明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年），地理學家王士性遊宦雲南，稱「土官多瘴，余入景東，過一地長五裏，他草不生，遍地皆斷腸草，與人馳過如飛。似此之地，安得不成瘴也」。因此，前人談瘴氣的消匿，也往往將它與土地的掠奪性耕墾聯繫在一起，《貴州通志》載大營等地：「昔山地未辟，多芭茅草，春夏長時高七八尺，周遍嶺谷。六七月花開之時，亦有香氣，嗅之則成疾。今則地土盡種包穀，而遷居者衆，煙火既盛，足以消瘴癘之災。芭茅盡除，而稻粱咸登，成樂土矣」（劉顯世等1948）。

(三)毒蟲生瘴說

古人認為南方多毒蟲，如果這些毒蟲的排泄物污染霧氣，就是瘴霧；進入水源，就成毒水。所謂「瘴者，毒蟲苑結，氣郁而升，常並山氣，蒸為煙嵐，蟲穴與山毒與之俱，中人如寒熱淫疾，大概瘴之本必由蟲也……滇黔重岩疊嶂，沮如停積，亦蘊隆而育蟲，此所以為瘴鄉也」（孫瑞徵等1876：5）。但古人所說的毒蟲並非僅指蛇蠍之類，在前面「關於瘴的名稱」中提到的一些動物，大都屬於古說的毒蟲範疇。

瘴毒污染水源，甚至使水不能引用。舊傳海南崖州藤橋有一溪，飲之即死，蓋諸黎瘴毒所聚，故諺云：「不怕藤橋鬼，只怕藤橋水」。這種情況，尤當初入雨季或暴雨驟作時最為嚴重，有云：「龍蛇之窟，托處深山，暴雨後山泉湧出，行人或掬而飲之，即腹痛膨脹，間且發狂」（陳宗海等1887：1）。又稱廣東沿海有「漲海多瘴，飲其水者腹亦脹」的現象（屈大均1985：130）。南方有毒的水體，有稱作瘴江或瘴海的，當然也含有瘴毒如江海廣大之意，使古人常懷恐懼之感。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韓愈貶潮州刺史，途中作傷感之詩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¹²，可見他還沒有到達廣東，已隱隱感到即將被瘴氣吞沒。總之，在古人的想象中，南方蟲多毒深，以致「草木水泉皆廩惡氣」¹³，蟲物所染之處皆含瘴毒。

在毒蟲生瘴說中，清初的廣東番禺學者屈大均（公元1630～1696年）倡有新論：「瘴者，蟲之所蘊釀者也，故凡濁陰勝，則為冷風冷瘴；濁陽勝，則為熱風熱瘴。其源因於霧，亦因于風，蓋霧之為瘴者十而七，

¹¹ 見《全唐詩》，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詩

¹² (唐)韓愈《韓昌黎集》，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詩

¹³ (宋)王栻《瘴癘說》，轉引自廣西《永安州志》，卷1，氣候，光緒24年(1898)增刻本。

風之為瘴者十而三。嶺南多霧瘴，滇黔多風瘴，是皆氣候之最惡者也」（屈大均1985：22-23）。而關於蟲的來源，屈氏又深信由風不流暢產生。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的瘴氣成因諸說，似乎可以找到一個「郁」字為共同特點，如草木鬱郁、濕熱蒸郁、地形郁閉、毒蟲郁結皆能生瘴，其思想均肇基於古代自然化生論，與「腐草化螢」說類同。

(四)瘴區的地理分佈

中國古代的瘴區分佈極廣，除華南和西南為人所共知的瘴區外，據文獻記載東南亞的許多地區亦有瘴氣¹⁴，甚至西北地區和青藏高原也不乏瘴氣之說。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五月壬午，(朝廷)以西涼府覓諾族瘴疫，賜藥」¹⁵。宋之西涼府，治所在今甘肅武威縣。據《清稗類鈔》的說法：「蒙古各地，皆有漢人貿易，惟冬令苦寒，時有冷瘴中人，使人腿足腫潰」¹⁶。而西藏的瘴氣，同樣有地方誌記載依據，其稱：「甲錯大山……本為天險，且有瘴氣，內抵拉孜僅一站」(松筠1798)；「前藏西北途長，淤沙積雪，煙瘴逼人」等(黃沛翹1886)。有關我國高寒地區的瘴氣問題，據馮漢鏞先生的研究，有些瘴病實際上是今天所說的高山缺氧綜合症狀¹⁷，當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疾病。這樣看來，中國西北和青藏地區的瘴患描述很大部分是傳統瘴氣概念的引申。

筆者根據地方誌和有關文獻記載，繪出明清時期中國南部的瘴氣主要分佈地點。由圖可見，瘴區相對集中於華南丘陵和雲貴高原，其北界約自閩南、贛南，湖南的郴州，貴州三都、獨山、鎮甯，至雲南元謀、騰沖一線，以及臺灣的嘉義和高雄等地，大致包括北緯26度以南的熱帶和中亞熱帶濕潤地區。但歷史上著名的重瘴區，多數見於北緯25度以南，如「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為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屈大均1985：25)。重瘴區又有大、小法場之喻，令人聞聲生畏。廣西《平樂府志》稱：「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為大法場，言(瘴癘)殺人之多也……廣東以新州為大法場，英州為小法場」(清桂等1805：6-7)。另外，橫斷山脈的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等以及大渡河河谷也都曾有嚴重的瘴患記載。據載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時四川采木建昌，去省城三千里，采運人夫歷險渡瀘，觸瘴死者積屍遍野」¹⁸。瀘水，今四川、雲南交界雅礮江口以下的金沙江河段，史稱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即指此。北緯26度以北地區可以視作瘴氣的散發流行區，在浙江平陽，福建浦城、建甯，江西武甯、修水，湖南沅陵，貴州施秉，四川馬邊，雲南巧家等地也曾有瘴氣記載。

在瘴區，瘴氣的危害深淺常因地理條件而異，湖南《桂陽縣誌》對此作了較好的概括，其稱瘴氣「隨地所染，亦有淺深，如山林回復，草茅障翳，炎氣鬱蒸，嵐霧優薄，則其為害也深。或有天道陰晴不一，此疆彼界，村落遭際不同，其害重輕亦異。至於城郭之間，山不高壓，地又寬平，煙火輻輳，氣得舒暢，與夫寬大鄉村，亦能遠害。其或淫亢日久，害亦惟均」(常慶1817：86)。可見瘴患尤其與一些特定環境或環境變化有直接和間接聯繫，就今天的疾病地理觀點分析，古瘴區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南方地方病、傳染病歷史分佈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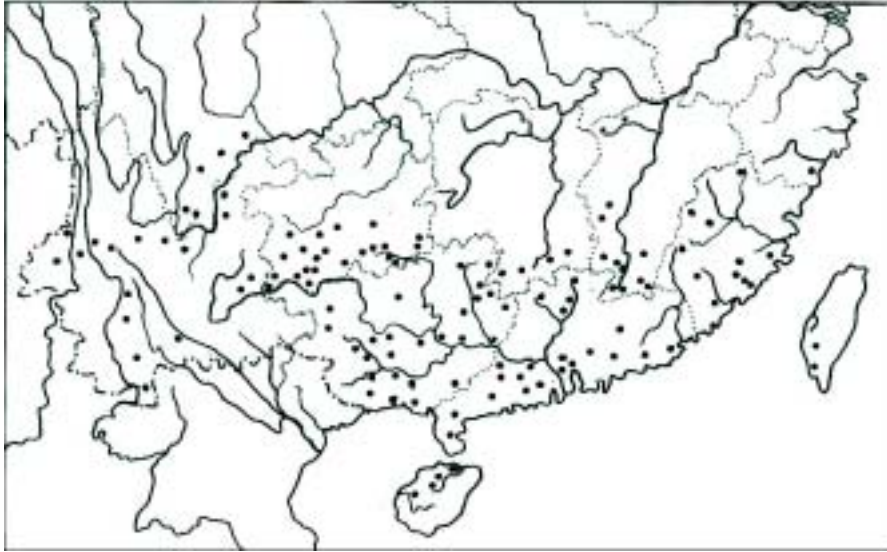
¹⁴ 例如(唐)李延壽《北史》(1974年，中華書局)載真臘國「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見傳 83，真臘。

¹⁵ (元)脫脫《宋史》(1977年，中華書局)，真宗本紀，頁 143。

¹⁶ 同 6。

¹⁷ 同 6。

¹⁸ 見明《神宗實錄》，卷 313，八月己巳御史奏疏。



圖：明清時期的中國南部瘴氣分佈
(據地方誌記載點繪)

四、瘴氣現象的描述

瘴氣究竟是一種什麼現象？在許多歷史文獻中有過確鑿描述，如古人接觸到廣西的瘴氣現象有：「瘴癘為害，有形者如雲蒸，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異香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陳蘭滋1834：8)。但為何古有瘴氣而今無瘴氣，這個問題可以說長期以來令人迷惑費解。筆者根據文獻分析及體會，對古說之主要瘴氣現象作如下考釋，並各擇一二例予說明。

(一)瘴氣為霧

古人所說的瘴氣，霧為其中主要現象。據福建《永春州志》向讀者介紹該地的瘴氣現象說：「嵐瘴獨盛，重者點點如遊塵飛沙，犯之衣巾俱濕，或晨起山村盡失，五六月猶爾。故善攝生者，恒晏起以禦之」(杜昌丁等1757：5)。此純指山區大霧。霧，別稱嵐，能損害健康的霧，自然就有嵐瘴、瘴霧之稱。但霧何以具有致病性？這又與古代的病源論有關，古人認為冒犯霧、露都是足以致病的外源因素，甚者可以致死。因此，地方誌也有不談瘴氣，直言霧為致病原因者，如論「開州，在貴陽極北。山高嵐重，十日九陰，飛霧濛濛，中人成疾」(劉顯世等1948)；「貪涼飲冷，多為黑霧所中」(廖蔚文等1946)等。

(二)瘴氣為塵霾現象

江西《安遠縣誌》稱該地瘴癘頗盛，有一種瘴氣，望見「其氣似煙非煙，似霧非霧，名煙瘴，即俗謂蒙沙天也」(黃文燮等1823：3)。蒙沙天之多病，又見廣西《武宣縣誌》載：「山色微蒙，天氣凝瘴，俗謂之蒙沙。凡遇蒙沙，四民必慎起居，六畜多病」(朱昌奎等1934：58)。這種影響大氣透明度的現象，應該就是現今氣象觀測上指的霾或浮塵天氣現象，於是瘴氣也乾脆有用塵沙命名者，如江西《義寧州志》載黃沙瘴，凡「夏秋間陰翳，有黃沙瘴著水多毒」(曾暉春等1824：6-7)。嚴重的浮塵、霾或揚沙天氣，對人體

呼吸道皆有不良刺激，而此時采食的露天蔬果作物等，因沾染大量異物或致病菌，往往致人以消化道疾病，古今都見有記載或報道，這也許就是古人把大氣中的塵霾現象視作「瘴」的原因。

(三)瘴氣為濕熱空氣

舊稱貴州歸化縣有個叫火烘的地方：「去城僅十五裏，入夏以來，草木暢茂，地氣蒸騰，烈日當空，其熱如火。時有氣出岡巒叢樹之間，如擁嵐，如散霞，微雨斜飄，長風送遠，如炊甑之氣撲人面目，此即瘴也」(劉顯世等1948)。這股在地形小氣候條件下形成的湍流熱浪氣體，多與山谷窪地或空氣不易流通的閉塞性地貌有關，尤其盛夏午後，高溫高濕而使人悶熱難當，古人指為炎瘴。

(四)瘴氣為大氣光電現象

《黎平府志》述黔南山地多瘴情形云：「每于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蝕，丹碧瀰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俞渭等1892：13)。此系微雨之後，由於空氣中飽含水滴對陽光的折射、衍射而產生的光象。文獻上對瘴氣有色有彩的記載，均為古人對大氣光象缺乏科學認識所致，如雲南《騰越廳志稿》稱該地瘴氣無處無之，於烈日照射之下即可見「五色斑斕之狀」等(陳宗海等1887：1)。

瘴母的傳說已在前面多有敘述，更有甚者，廣東沿海舊指「半虹」為瘴母，謂「雷之州，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亦曰颯母，又曰瘴母，瘴母起則颯風隨之。颯生於瘴，瘴為氣，颯為風，氣者風之母，故曰颯母。颯母先成形而為半虹，胎風其中，經四五日而後颯發」(屈大均1985：26)。半虹，俗又稱斷虹。有時出現在東風波、熱帶低壓或熱帶氣旋週邊雲系的濃積雲群中，沿海居民常視為颯之先兆，把它說成「颯母」亦不無道理，但若此瘴母之說誠鮮有所聞。又，前述有關瘴母如「彈丸」、「車輪」的原始傳說，筆者認為從球狀閃電方面或可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釋。

(五)瘴氣為山澤氣味

廣西永淳縣昔見「岩洞溪壑之間，其氣如絲、如縷、如霧、如雲，聞之或香、或酸、或糯米飯之氣，或有焦臭之味者，皆瘴也」(陳蘭滋1834：8)。這些具有明顯氣味的瘴氣，相傳以香花瘴最烈，其「氣如桂菊，行經山徑草莽間，勃勃投鼻，日午尤甚，人吸之毒入心脾」(黃文燮等1823：3)。但據《連州志》的說法：「木樨開時，嵐氣隨之入人，為香花瘴」(李蕢等1673：5)。則此瘴的氣味為山野間桂花等植物香氣無疑，然更有甚者為其渲染成妖，有云：「瘴以香誘人，愛其香而以鼻呼吸，則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藥矣」(屈大均1985：22-23)。現在雖然很難明究瘴的諸種氣味——源于何物，其包括植物開花、有機物腐爛分解以及臭氣等皆有可能，但毒性之說大多屬於訛傳是可以肯定的，與過去盛傳南方土著蓄蠱害人同為子虛烏有。

然而在郁閉度很高的熱帶原始森林中，所謂的瘴氣還可能存在另一種情況，如高溫高濕環境由動物屍體或有機物堆積腐爛，產生甲烷、氨氣、硫化氫等氣體，在不易稀釋的情況下給人以惡性刺激，但卻毫無上述的香氣可言。如1950年4月9日，國民黨第8軍709團李國輝部赴緬甸小孟板途中，即遭遇到這種氣體。據張雲岳先生回憶：「古老的山林中有瘴氣。現在，他親身體會到了。當他走近濃如重霧，擋住前路的雲煙時，一股腐臭之氣撲鼻而來。他感到象被人打了當頭一棒一樣，噁心得忍不住大口嘔吐，只好退了下來。因此，每日只有當太陽當空、雲煙消散時才能行軍前進」(楊木1987：22)。

(六)瘴氣爲地質溢氣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十一日,有位地方官員赴任廣西,道經郴州時說:「耒山產煤,雨後煤氣如雪,上與雲齊,風來吹散,濛濛成霞,觸之有硫磺味。噫嘻,此瘴鄉也」(楊思壽1983:7-8)。可見作者接觸到的這種瘴氣,是由煤礦露層飄溢出來的二氧化硫氣體。同樣在地質構造薄弱地帶,確實存在某種地質溢氣現象,有些氣體含毒性或刺激性成份,歷史上對瘴氣具有劇毒性質的可怕描述,大致與這種情況有關。

雲南省保山地區處橫斷山脈,也是歷史上瘴氣的原始傳說地區之一,從清代數種《永昌府志》記載可知大概。境內騰沖縣有一個叫「扯雀塘」的地方,崖壁的岩隙中會不時溢出硫化氫和一氧化碳氣體,人若接近此地便感到眩暈,而當鳥類飛越該塘的一定範圍時,竟然墜落而死(蘇山2001)。這種奇異現象在漢代即有所認識,如《後漢書》引馬援述漢軍南征之艱辛曰:「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蹙墮水中」¹⁹。後人說瘴氣者,常以此爲最駭人的瘴毒現象。至於強烈的地質活動或火山噴發形成的大量窒息性氣體,則已不在古人所論說的瘴氣範疇。

綜上所述,昔人所見的瘴氣,實際上包羅多種自然現象,大部情況下是對某些天氣現象的誤解,加上傳言之過,遂蒙上一層神秘色彩。

五、瘴的疾病考釋

觸染瘴氣所患的疾病,俗謂「中瘴」。但多數稱之爲瘴的疾病卻實際上與瘴氣無關,瘴病的概念既相當廣泛又十分模糊,病種泛濫至「一歲無時無瘴」,然按多數發病規律,當以季節性爲主要特點。《永昌府志》稱:「景東、蒙化多有瘴,西至永昌殆甚……瘴起,以春未止於秋杪。江堤草頭相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時行旅皆絕,江岸居民色多黃瘠,惟婦女不染。楊升庵《元謀行》云:十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宣世濤1785:1-2)。歷史上的瘴病究竟包括那些疾病?這同樣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一)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貴州《興義府志》說:「每年夏間發生瘴癘,觸之者頭痛發熱」²⁰,此症無疑屬於中醫外感病範疇,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普通感冒或上呼吸道急性感染一類症狀。隋代醫家巢元方指出:「夫嶺南青草、黃茅瘴,猶如嶺北傷寒也」,歸納其治法,「其一日二日,瘴氣在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強重,若寒氣在表,發汗及針必愈;三日以上,氣浮於上,填塞心胸,使頭痛胸滿而悶,宜以吐藥,吐之必愈;五日以上,瘴氣深結在臟腑,故腹脹身重,骨節煩疼,當下之」。此巢氏論瘴,無疑是漢代張仲景辨「傷寒」之小翻版,而中醫傷寒病多數是敘述感冒症狀的。

瘴疫包括流行性感冒。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間,福建臨汀(今龍岩地區)一帶瘴疫大作,當時使用中藥「紫蘇散」治療,愈者甚多²¹。方劑中的主藥紫蘇具表散功效,爲治療感冒良藥,今民間尚多用之。廣西《永寧州志》亦稱觸染瘴氣得病者,「投以苦辛之劑即愈」(高曄等1885:12)。由該類型的中醫方劑

¹⁹ 浪泊,據(宋)胡三省通鑑地理注:「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

²⁰ 轉引自劉顯世《貴州通志》(1948),風土志,氣候。

²¹ 見《臨汀志》,卷4,祠廟,頁3。華陽喬氏三莊精舍據《永樂大典》過錄本。

可知，所治瘴病當為感冒無疑。又如貴州《冊亨縣鄉土志略》所云：

本縣氣候，濱江地帶確實酷暑，夏秋兩季雖赤身裸體，亦汗流如霏。此外僅六七八等月較為炎熱，午時前後感覺頭腦眩暈，苦悶難當，朝暮仍清風習習，竟體生涼，夜深尚須覆被，否則即易感冒。若遇天雨，大有秋意，必加厚衣服，始能支持，蓋寒暖不時，殊難預測也。外間傳說冊亨瘴氣甚重，動輒得病，人皆視為畏途，實則道聽途說，無稽之談耳(楊國華1942：3)。

明清地方誌總結許多避瘴經驗，從中亦大可悟得過去普通瘴病之端倪，如：「急脫急着，勝以服藥」(張國經等1637：34)；「人或腠理不密，揮汗如雨，終不可解衣當風」等(陳蘭滋1834：8)。這些經驗指的就是謹防傷風感冒。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歷代中原貶官流人發配南方煙瘴地者，據說病死率很高，恐怕與其心境憂鬱有很大關係，因為長期情緒低落會影響免疫能力，從而易患包括感冒在內的各種疾病。明儒陽明先生說自己貶在貴州修文縣三年來，「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²²。可見保持樂觀愉悅心情，也是古代避瘴的衛生要訣。

(二)瘧疾

瘧疾為主要瘴病，早在唐代就有醫生提出這個觀點：「夫瘴與瘧，分作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嶺南率稱為瘴，江北統號為瘧，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²³。據統計，我國在20世紀40年代患瘧者達3000萬人，尤以北緯25度以南地區多惡性瘧(浙醫大1984：210)，這與歷史上重瘴區的分佈是一致的。在一些地方文獻中，對此也有進一步的說明，清·李宗昉《黔記》稱：「貞豐、羅斛、冊亨皆多瘴氣，病瘧者多死，江西之賈于羅斛者，必經三瘧乃可保，有賈姓已十八病矣」²⁴。可見昔日黔地多惡性瘧，黔人亦視瘧疾為瘴癘。故《貴州通志》說：「黔地昔多瘧癘，讀王陽明《瘧旅》一文，往往如談虎之變色，視為畏途。實則今昔異勢，現除近粵、桂邊地偶有發現外，風土悉同內陸。又經近代醫學上之考驗，實系惡性瘧疾，並有防制醫療之法，別無神秘」(劉顯世等1984)。

我國歷史上有許多進入西南重瘴區而少有生還的記載，當部分與感染惡性瘧疾有關。如唐代四川每年從合州調戍軍士赴雲南，「歲以兵五百人戍姚州，地瘴輒死」(熊相1518：19)。12世紀初葉，宋室南遷，中原百姓紛紛避禍江南，「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瘧癘，至有滅門」(莊綽1983：64)。同樣，惡性瘧也有隨感染人群流動而播散，在北方造成大流行的情況。金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女真軍隊大舉南侵，據當時名醫張從正說：這一年瘧癘甚毒，南征士兵患病者「十死八九」，次年班師回朝，中原地區因之「瘧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輕者旬月，甚者彌年」²⁵。晚近的例子如1953年遼寧省綏中、興隆等地駐有大量南方軍隊，大雨後該地突然暴發瘧疾流行(鍾惠瀾等1986：651)。

瘧疾以瘴名，歷代亦稱呼各異，隋人因「其狀發寒熱，休作有時」，有「山瘴瘧」之稱；宋代按「寒多熱少，或寒少熱多，或累日、間日之異」症狀，有稱作「冷瘴」者；明清則根據瘧疾多發於秋禾登場之際，俗呼為「新禾瘧」或「黃茅瘧」之類。同是瘧疾，其稱謂雅俗各隨時代南北而異，猶如近代北方稱瘧疾為「打擺子」，浙江沿海叫「打半日」的情況一樣。

²² 引文同 4

²³ 張文仲《隨身備急方》，轉引自余德堦《疫證集說》(1911)，卷 2。張文仲，唐武后時為侍御醫，新舊唐書有傳。

²⁴ 轉引自《貴州通志》(1948)，風土志，氣候。

²⁵ 據(金)張從正《儒門事親》，卷 1，瘧非脾寒及鬼神辨四。

(三)中暑和恙蟲病

宋人王栻在《瘴癘說》中稱：「若夫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郁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飲食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滯一二日，則血凝竟不起矣。南方謂之中箭，亦謂之中草子」²⁶。熱瘴的發病，頗類中暑或日射病，《廣西通志》亦稱熱瘴由旅遊不慎，「觸熱征行」所致(蘇浚1599：43-44)。可見瘴病包括有暑症一類的時病。但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有，熱瘴的症狀又似乎包括恙蟲病在內，恙蟲病是一種稱作立克次體的細小病原體感染，宿主恙蟎喜生活在高熱陰濕的林緣草莽地帶。昔傳人行茅草叢間，多為瘴氣所中，這首先提供了被恙蟲叮咬的機會。熱瘴常見於盛夏初秋，與恙蟲病的發病季節一致，我國恙蟲病的地理分佈也與多瘴區基本相合；同時恙蟲病所表現的稽留性高熱和斑丘疹，以及嚴重病例的紫紺等，與熱瘴發作時「熱晝夜不止」，伴有「血凝」等症相近。又，民間有暴雨後多瘴毒的經驗之談，就恙蟲病而言，當與雨後地面恙蟲擴散，人體感染機會增加有關。當然，暴雨之後的瘧疾、食物中毒、菌痢和鉤端螺旋體病等發病率增加，也可能是共同構成此時水多瘴毒的眾多因素。

(四)消化不良和腸道傳染病

廣西《永安州志》稱：「瘴癘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痞痰結」(李常霖等1898：42-43)，因此，瘴病當包括有消化不良和胃腸道疾病在內，故古人治療瘴病有使用中醫方劑平胃散、正氣散為主的。胃腸感染常與南方雨季有關，《同正縣誌》解釋說：「當四五月新水方生，挾澗谷之泥土而來，食之多腹痛泄瀉或感冒暑濕鬱為痧症，使人四肢沈困，倦於行坐，此所謂黃梅瘴也」(曾瓶山等1932：1-2)。在梅雨季節，陰雨寡照導致病菌滋生，兼之人體的腸道抵抗力隨溫度升高而減弱，易發生急性消化道感染，腸道傳染病也開始進入高發階段。大概在眾多胃腸疾患中，以痢疾在昔時最為普遍且具傳染性，故諸瘴中別有「瘴痢」之名。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間，江西新城縣流行「山瘴疫痢，民多沾染，幾乎死亡」(黃文燮1516：58)。俗稱「病從口入」，所以民間避瘴有控制飲食之說：「粥飯宜少不宜多」(陳蘭滋1834：8)、「能戒葷腥則易除」(方求義等1750：3-4)云云。此強調飲食衛生以祛病，誠為經驗之談。又聞川廣人喜食檳榔，其俗亦與瘴氣傳說有關，意在消食降氣以祛瘴。

(五)水土不服

歷史上南方瘴氣聲名遠播，主要為仕旅北人所渲染。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北人南遊，不勝長途跋涉之苦，加上對南方氣候、飲食均不習慣，易產生各種不適症狀，所以古人分析瘴病又有「土著之民習而不覺，至仕旅驟至其地，一中其毒，即成疾病」的特點(陳蘭滋1834：8)，水土不服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明季江陰人張炳提及他在福建的一段親身經歷說：「余自成化甲午歲(公元1474年)秋來浦城，浦城地頗瘴癘，又寒暑異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余亦累歲多病也。每獲士亨療之，劑所投無不愈」(黎民範等1609：15)。因此，談瘴者又給水土不服起了一個十分形象的名稱，叫「回頭瘴」，謂該病啓程回家則愈。《廣東新語》曰：「回頭瘴，則因不能其水土，冷熱相忤，陰陽相搏，遂成是疾」(屈大均1985：25)，是很有道理的。北人對南方水土氣候的不適應，也是北人視南地多瘴的原因之一。

²⁶ 轉引文獻同 13

(六)鸚鵡熱

明代《稗史彙編》載：「鸚鵡瘴。廣南多鸚鵡，養之，忌以手頓觸其背，犯者甚，多病顛而卒，土人謂鸚鵡瘴。偶親驗之」(王圻1993：2469)。這應該是現代稱作「鸚鵡熱」或「鳥疫」的一種傳染病，因接觸帶病鸚鵡或禽鳥而感染衣原體所致，屬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於歐、美以及亞洲的部分地區。而鸚鵡熱在我國至今尚未見有明確的流行報道，僅於1960年在北京某鴨場的患者血清中測得該病原的補體結合抗體，從而推斷本病存在於國內的可能性(鍾惠瀾等1986：347~351)。但根據以上所載，則鸚鵡熱也是我國古老傳染病之一，起碼在作者的有生之年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前，對該病的傳染原因和症狀有過足夠的認識，在我國鸚鵡熱流行史上，這則史料是否屬於最早記載，尙有待進一步確認。

(七)中毒

具有毒性或致病性是古瘴氣傳說的基本特性，因而南方有些中毒現象也就自然包括於瘴病之中，除前述地質溢氣外，中毒情況往往與洞穴或水毒有關。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雲南監察御史胡涇向朝廷報告：楚雄、大理、洱海等衛軍充作礦夫者，礦洞銀產量不高，而採礦士兵大都因瘴毒死亡²⁷。此職業中毒事件或許與銀礦伴生的有毒元素所致。《本草綱目拾遺》稱：「滇廣山瘴，有一種人受之終身不能語，名曰啞瘴」(趙學敏1887)。這種以啞症為名的瘴癘，不排除高燒引起的致啞因素，所謂「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啞瘴」(周去非1996：83)。但亦存在中毒情況，如雲南鳳慶至大理的古驛道上過去有個「啞泉」，系基岩裂隙水，日出水量43.2立方米，泉水含砷元素，不慎飲之者多成啞巴，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特於泉旁立碑：「此水啞毒，過往之人不可飲」(蘇山2001)。另外，雲南多銅礦，礦脈所滲之水常含過量的硫酸銅，飲之亦會刺激聲帶而失音。淺表地下水中毒引起的集體死亡事件是十分可怕的，1935年10月有一支北征部隊宿營甘肅環縣耿灣，飲用某溝谷中的泉水，次日發現該部300人全部猝死。這件懸案直至50年後的一次偶然機會才得以澄清，原來溝谷水中的鉀、鈉離子含量異常偏高，恰與地下斷層溢出的氟氯化合成劇毒的氰化鉀和氰化鈉，飲用該水可導致中樞神經麻痺而死亡(掌征美1994：27)。此例雖與瘴毒無關，然足以說明一些莫名的瘴氣(水)中毒現象當與類似的地質因素有聯繫。

(八)南方一切疾病的統稱

細究瘴病包括的疾病相當複雜，唐代劉恂《嶺表錄異》認為染瘴「多病臃脹成蠱」為主²⁸，貴州安順等地的瘴氣「中人如瘡，輒病黃疸」(衛既齊等1692：4)，廣東的瘴氣「其中於人也，多生疾，或黃羸、足重、偏枯、癩疥不一矣」(郭裴1601：16-18)。包括皮膚感染和不明傳染病，亦概指瘴氣作祟，如浙江海甯《湖步鄉土志》載該地有一深洞，「洪楊時，村民大都避難于此。亂平復出，但當時雖亂兵無可施其術而倖免，惜皆受瘴氣過甚，患病患毒，生者很少。聞患者生，患病者必死，至今身深歷其境的父老猶得歷歷道及」(錢飛虹1929)。顯然，瘴病的範疇，不僅涉及南方的多種地方病，尤以許多烈性傳染病為突出表現。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01年)江西永寧縣瘴疫大流行，「瘴死幾千人，村落為之蕭條」(陳欲達等1683：14)。有人總結其歷史流行特點云：「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清桂等1805：6-7)。這裏所說的「運氣」，系中醫「五運六氣」學說的簡稱，該說是中國傳統醫學研究氣候變化和疫病流行規律的經

²⁷ 見明《憲宗實錄》卷114，巡按雲南監察御史胡涇等奏。

²⁸ 轉引自廣西《百色廳志》(1882)，卷3，氣候。

典學說。此指瘴疫大流行，也具有數年一作的周期性。

瘴病範疇之廣，甚至包括牲畜和農作物病害。江西武寧縣昔傳「春盡，有黃丹瘴則損麥」(陳雲章等1824：11)，很可能指麥類黃銹病；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連續兩年，福建莆田一帶牛瘟大作，「牛多瘴死，以人力代耕，農甚苦之」(林揚祖1821~1850：39)。又《建寧縣志》載該縣瘴氣甚微，不危害人而專損牲畜等(韓琮等1759：14)。

對於歷來瘴病的複雜性，有理由認為：瘴為南方一切疾病之濫稱。廣西《永安州志》引古語曰：「南人凡病皆謂之瘴，鮮有服藥，多信神鬼」(李常霖等1894：42-43)。這種現象，當屬於南方巫醫盛行時期，爾後風氣稍開，服藥求治，又多被庸醫所誤。宋儒梅摯說：「南人百病不問症候，通命曰瘴，妄投藥石，速禍者衆」²⁹。可見當時南方百病皆以瘴名，統以瘴治，病之不治者，亦歸咎於瘴。

六、瘴氣消失之探討

中國古代有關瘴氣的記載或傳說，至今近20個世紀，人們對此的認識亦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A)**漢至西晉，對南方氣候和疾病地理積累有較多知識，形成「瘴氣」概念。**B)**東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大批人口流寓南方，瘴氣之說漸為士大夫階層認同。**C)**隋唐至宋元，醫家和文人對瘴之疾病地理、症狀和防治方法見有深入探討，並引起政府重視。如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為解除廣南軍民瘴患，皆由政府置醫藥，選派醫官治療。**D)**明清時期，瘴氣之說為南方地方誌普遍記載，但經清乾嘉以來大墾殖後，該說亦漸趨消匿。其原因可由以下三個方面加以分述：

(一)環境之變化

據載清代中葉的廣西東蘭縣苦於煙瘴，自開鑿河道後，瘴患隨之稍減(千人俊等1926)。關於瘴患的古今變遷，許多地方誌都提到得於規模農業開發和人口集聚，前人有述其原因云：「火器驚瘴，亦暗合學理，在昔多瘴之鄉，每因煙戶日增，而瘴癘日減，同此理也。故開發山澤，其氣自暢，人迹既蕃，毒藪必將盡除，則不惟生產增加，並可消彌嵐瘴，蓋地氣固有時而變，亦可以人力勝，所謂人與天爭也」(廖蔚文等1946)。至於貴州《清江廳志》說該地當開闢之初，多山嵐瘴氣，後經當地駐軍「操練槍炮之聲，火藥之氣震蕩山谷而解之」(劉顯世等1948)，這些說法，恐又源於先民濃厚的五行厭勝思想。古人視南方茂盛植被為瘴氣孳生地，因此更多地把砍伐森林和瘴患的消失聯繫在一起。如清康熙時(公元1662~1722年)，傳聞廣東鎮安怪異屢現，瘴癘甚毒，入其境往往無生還之望。而當乾嘉間(公元1736~1820年)，不惟異聞全無，瘴亦不甚覺。當地居民對此解釋說：「昔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煙陰霧，凝聚不散，今人煙日多，伐薪已至三十裏外，是以瘴氣盡散」(趙翼1982：45)。這應該是一種時代的誤解，其後果不言而喻，因為大量砍伐森林只能使生境變得惡劣，而自然疫源性疾病由於環境的突變也往往更易侵襲人類。

(二)神秘感之消失

古人對於瘴氣的恐懼，無疑含有許多歷史訛傳成份，故古之瘴區無一不是交通和資訊相對閉塞之區。古瘴區的變遷即大致呈這樣一種規律：南方的經濟開發每拓展一步，瘴區之地盤就隨之萎退一步。如唐代

²⁹ (宋)梅摯〈瘴解〉，轉引文獻同13。梅摯，新繁人，慶曆(公元1041~1048年)時為侍御史。

視江南為瘴區，宋人則指嶺南為瘴區。而在明代，昔號瘴鄉的嶺南，許多地區的瘴氣早隨經濟發展而煙消雲散，16世紀中葉有一篇《遊嶺南記》稱：「余裏中人歲一二至，未嘗有觸瘴氣死者……(今)嶺間車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氣盛而山毒消，理也」(葉權1981：195)。更重要的是，清雍正年間(公元1723~1735年)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後，大批人口湧入西南邊陲墾荒，處雲南邊境的廣南、開化二府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擁有外來墾荒者數萬人，而普洱府的移民合當地各族茶農竟達數十萬之眾，以至雲南省凡水陸可耕之地，俱為移民墾辟無餘(王育民1995：518-520)。可以這樣說，歷經百餘年的大墾荒運動，中國西南這塊歷史上最可怕的瘴區亦無復神秘之感。

(三)醫學知識之進步

瘴氣觀念的改變或淡化，歸根結底應視為時代和科學的進步。注意到與大墾荒同時，近代醫學亦處於長足進步時期，以“牛痘術”和微生物知識為代表的西方醫學之東漸，包括中醫學自身學術改革的成就，對傳統思維形成巨大的衝擊，最終為國人所接受。因此，南方瘴患之說尤其在近代迅速消失，並非流行病學意義上的病原隱匿或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而是對過去統稱為“瘴”的疾病，有了更確切的醫學普及認識。如瘧疾在西南過去是稱作瘴的主要疾病之一，現今則無復有稱之為瘴瘧者。此種情況可以說比比皆是，與南方曾經流行的“痧”病之說相似。痧病之說大致始於明末清初，狹義之痧包括中暑和急腹症。1820年真性霍亂從印度傳入中國後，曾普遍稱之為：絞腸痧、吊腳痧、癘螺痧等。自1883年證實該病為感染弧菌所致，此後醫界遂無以霍亂為痧者。

七、結論

中國歷史上的瘴氣是一個複雜問題，由眾多瘴的名稱即可知其大略。綜合古人對瘴氣成因的認識，可概括為氣候、地形、植被和毒蟲諸說，反映了古代以“郁”字為共同特點的病原自然生成論。但分析相關文獻的瘴氣現象描述，卻大部是對霧、霾、浮塵或大氣光電等天氣現象的誤解；而有些具窒息性或毒性的瘴氣現象，可能屬於地質溢氣以及有機質的缺氧分解等原因。有關瘴的疾病概念亦相當模糊，廣義之瘴病幾乎泛指南方一切地方病和傳染病，尚包括一些家畜和農作物病害。狹義的瘴病則為感冒、瘧疾和暑症等類，瘴疫主要指流行性瘧疾，包括流行性感冒等急性傳染病。歷史上的嚴重瘴患大體系惡性瘧肆虐所致，根據明清地方誌所繪的南方瘴區與惡性瘧之地理分佈相近。

在有關瘴氣的研究中，古瘴區的變遷也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古代北人對南方瘴區的認識似乎基於疾病地理和氣候方面的相對概念，而實際上與當時南方的經濟相對落後有著更本質的聯繫，故凡歷代隨著南方經濟的不斷開發，瘴區即相應不斷萎縮。瘴之消匿的主要原因，系伴隨經濟發展的醫學文化進步，對傳統瘴病觀念的潛移默化，並不說明某種傳染病就此隨「瘴氣」而消失，我們只要對近代瘧疾流行情況稍加瞭解，就可明白這一點。但瘴氣之說畢竟在中國流傳達二千年之久，大量文獻中許多藉「瘴」記載的地理環境變遷、經濟開發史、疾病譜以及流行病學等歷史資訊，在今天仍具有十分意義的相關研究價值。此外，重嶠疊嶺的南方瘴區也是中國中古時期的特殊區域，這裏曾留下無數流臣逐客的悽愴詩句，銘刻萬里從戎將士的慨然悲歌，至今仍傳承古老質樸的土著文明，成為中華多元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晚近如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之戰，據稱集結雲南的許多清軍染瘴死亡，及旋師北返，于蒙自設醮以薦亡靈，複題一聯於齋壇云：「是誰浩劫催成，馬革分歸，蟲沙競化，更摧殘瘴雨蠻煙，試回看越裳殄瘁，漢

幟蒼茫，這無限國殤，各向天涯遙布奠。何處巫陽招得，關門月黑，塞上雲昏，盡淹滯忠魂義魄，倘他時三界輪迴，九幽度脫，願都為壯士，重來邊塞儼同仇」³⁰。本文援此結尾，並聊作歷代血淚南疆之祭。

徵引文獻

- 千人俊等(1926)：續纂浙江通志，卷 36，循吏，吳正一條，浙江：稿本。
- 干寶著(晉)，汪紹楹校注(1979)：搜神記，卷 12，北京：中華書局，156 頁。
- 方求義等(1750)：上猶縣誌，卷 1，氣候；卷 11，藝文，游紹安〈疫歎〉詩，江西：清乾隆 15 年刻本，3-4、29。
- 王士性著(明)，周振鶴編校(1993)：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廣志釋，卷 5，西南諸省，上海古籍出版社，384 頁。
- 王文驥修，李科等纂(1823)：開平縣誌，卷 2，氣候，廣東：清道光 13 年刻本，7 頁。
- 王圻(明)：稗史彙編，卷 159，禽獸門，北京出版社 1993 年影印本，2469 頁。
- 王育民(1995)：中國人口史，第 8 章，第 4 節，乾隆至道光年間人口大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518-520 頁。
- 江鍾岷修，陳廷棻纂(1932)：平壩縣誌，第 6 冊，瘴癘，貴陽：交通書局鉛印本，22 頁。
- 江藻修，鄭儵纂(1689)：龍岩縣誌，卷 2，氣候，見夾註舊志語，福建：清康熙 28 年刻本，15 頁。
- 朱昌奎修，龐賈辛纂(1934)：武宣縣誌，第 1 編，第 9 章，氣候，廣西：鉛印本，58 頁。
- 全免澤修，許實纂(1928)：祿勸縣誌，卷 1，氣候，雲南：鉛印本，33 頁。
- 李雲(1988)：中醫人名辭典，李鏐條，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310 頁。
- 李蕘修，屈琚、石光祖纂(1673)：連州志，卷 6，氣候，廣東：清康熙 12 年刻本，5 頁。
- 李常霽、鄧文淵修，吳纘周等纂(1894)：永安州志，卷 1，氣候，廣西：清光緒 20 年刻本，42-43 頁。
- 杜昌丁修，黃任、黃惠纂(1757)：永春州志，卷 16，氣候，福建：清乾隆 22 年刻本，5 頁。
- 松筠(1798)：西招圖略，審隘，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10 頁。
- 林揚祖(1821~1850)：莆田縣誌，祥異，福建：清道光間修，稿本，39 頁。
- 周去非(宋)：嶺外代答，卷 4，瘴，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3 年出版，83 頁。
- 屈大均(清)：廣東新語，卷 1，霧、瘴、半虹；卷 4，海水，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出版，22-26、130 頁。
- 宣世濤(1785)：永昌府志，卷 26，雜記，雲南：清乾隆 50 年刻本，1-2 頁。
- 俞涓修，陳瑜纂(1892)：黎平府志，卷 1，氣候，貴州：清道光 25 年刻本，13 頁。
- 高擘、聯豐修，劉漢鎮纂(1885)：永寧州志，卷 3，氣候，廣西：清光緒 11 年增刻道光 6 年本，12 頁。
- 郭栻(1602)：廣東通志，卷 1，氣候，廣東：明萬曆 30 年刻本，16-18 頁。
- 浙江醫科大學(1984)：傳染病學，第 4 章，第 5 節，瘧疾，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10 頁。
- 孫瑞徵、胡鴻澤修，鍾益馭纂(1876)：龍南縣誌，卷 1，氣候，江西：清光緒 2 年刻本，5 頁。
- 張日星等(1687)：樂昌縣誌，卷 1，氣候，廣東：清康熙 26 年刻本，13 頁。
- 張國經修，鄭抱素纂(1637)：廉州府志，卷 2，氣候，廣東：明崇禎 10 年刻本，34 頁。

³⁰ 見《清朝野史大觀》第 4 冊，死士發辦，頁 105，上海書店影印本。

- 陳宗海修，趙端禮纂(1887)：騰越廳志稿，卷1，氣候，雲南：清光緒13年刻本，1頁。
- 陳蘭滋(1834)：上思州志，卷6，氣候，廣西：清道光14年刻本，8頁。
- 陳雲章修，張紹璣等纂(1824)：武寧縣誌，卷1，氣候，江西：清道光4年刻本，11頁。
- 陳欲達修，袁有龍纂(1683)：永寧縣誌，卷上，災祥，江西：清康熙22年刻本，14頁。
- 莊綽(宋)：雞肋編，卷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64頁。
- 清桂修，王作人纂(1805)：平樂府志，卷32，氣候，廣西：清嘉慶10年刻本，6-7頁。
- 黃文燮修，徐必藻纂(1823)：安遠縣誌，卷1，氣候，江西：清道光3年刻本，3頁。
- 黃文鸞(1516)：新城縣誌，卷11，藝文，黃文鸞奏疏，江西：明正德11年刻本，58頁。
- 黃沛翹(1886)：西藏圖考，卷8，西藏藝文考，和寧〈西藏賦注〉，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261頁。
- 常慶(1817)：桂陽縣誌，卷3，氣候，湖南：清嘉慶22年刻本，86頁。
- 崔乃鏞(1753)：東川府志，卷1，氣候，雲南：清雍正13年刻本，4頁。
- 巢元方(隋)：諸病源候論，卷10，瘴氣候，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64-65頁。
- 葉權(1565)：遊嶺南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明史研究室編，明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5頁。
- 曾瓶山、楊北岑等(1932)：同正縣誌，卷5，氣候，廣西：鉛印本，1-2頁。
- 曾暉春修，冷玉光、查望洋纂(1824)：永寧州志，卷2，氣候，江西：清道光4年寫刊本，6-7頁。
- 掌征美(1994)：三百紅軍遭殘害，兇手竟是毒泉水，河南：中州今古，第2期，27頁。
- 楊思壽(清)：坦園日記，卷1，郴遊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7-8頁。
- 楊國華(1942)：冊亨縣鄉土志略，卷5，氣候，貴州：稿本，3頁。
- 廖蔚文修，董玉笙纂(1946)：三江縣誌，卷1，氣候，廣西：鉛印本。
- 趙思治修，單銳纂(1938)：鎮越縣誌，第16章，衛生，雲南：油印本，43頁。
- 趙學敏(1887)：本草綱目拾遺，卷1，白雲條，舊印本。
- 趙翼(清)：簷曝雜記，卷3，鎮安水土，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45頁。
- 管一清修，湯億纂(1754)：增城縣誌，卷2，風土，廣東：清乾隆19年刻本，26頁。
- 熊相(1518)：四川志，卷13，合州名宦，張柬之條，四川：明正德13年刻本，19頁。
- 黎民範修，陳玄藻纂(1609)：浦城縣誌，卷14，藝文，張炳，贈世醫李亨序，福建：明萬曆27年刻本，15頁。
- 範曄(南北朝)：後漢書，卷24，馬援傳；卷48，楊終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838-846、1598頁。
- 範成大著(宋)，嚴沛校注(1986)：桂海虞衡志校注，十二，雜誌，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11頁。
- 錢飛虹(1929)：湖步鄉土志，浙江：舊抄本。
- 衛既齊修，薛載德纂(1692)：貴州通志，卷7，氣候，貴州：清康熙37年刻本，4頁。
- 劉顯世、吳鼎昌修，任可澄、楊恩元纂(1948)：貴州通志，風土志，氣候，貴州：鉛印本，34-54頁。
- 魏收(北齊)：魏書，卷5，高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119頁。
- 鍾惠瀾等(1986)：熱帶醫學，第3編，第30章，鸚鵡熱—鳥疫，第9編，第71章，瘧疾，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347-351、651頁。

- 韓琮修，朱霞、徐時作等纂(1759)：建寧縣誌，卷 4，氣候，福建：清乾隆 24 年刻本，14 頁。
- 蘇山(2001)：試釋禿龍大王的殺手鐮，中國氣象報，四季風專刊，北京，5 月 31 日，第 3 版。
- 蘇浚(1599)：廣西通志，卷 3，氣候，廣西：明萬曆 27 年刻本，43-44 頁。

收稿日期：91 年 11 月 11 日

修正日期：92 年 3 月 8 日

接受日期：92 年 4 月 20 日

